

一、日本文化的理论研究

本章主要探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百多年间日本文化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章主要限于从社会、哲学、文学、语言、艺术等角度论述日本人、日本文化特点即所谓日本文化论的论著。众所周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编的《战后日本人论年表》(野村综合研究所,1979),统计仅 1946 年至 1978 年的 32 年间,有关日本人论的著作就问世 698 种之多。若把此前后的成果全部统计在内,总数不下于数千册。若将这些庞大的论著悉数作一总结,这近乎天方夜谭。因此,本章只能择其主干,将较能反映该时代特征的代表性成果作一描述。

1. 日本人种优劣说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敞开国门,努力吸收西方文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大量涌入日本。面对来自完全不同体系的文明,人们自然地两种文明、两种人种进行对比。因此,这时期的日本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上。明治初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不少人感到困惑、甚至失望,于是“日本人种劣等说”广为流行,盲目崇洋的现象甚为严重。明治中期后,文化思想界开始反思这种欧化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强调日本也有优于西方之处,主张保存国粹,日本主义初露端倪。明治后期,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人种优秀说”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比较冷静、客观地开展了日本国民性的研究。

['日本人种劣等'文化论]

为了尽快追赶上西方的步伐,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大量引进欧美的文化技术。面对着先进的文明和身高体健的欧美人,不少人在文化上和人种上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欧美人种优秀”“日本人种劣等”说开始广为流行。

法学家津田真道在《想象论》(《明六杂志》,第13号,1874年6月)中认为:“我日本人虽为黄种,但不崇尚黄色,喜欢白

色皮肤,盖为天性。故本来就具有喜欢西洋的天性。自我国改变锁国的政策以后,仅二十余年,我国人民从被服器具至文物制度,一切模仿西洋。明确表达了崇洋的倾向。津田在《内地旅行论》(《明六杂志》,第24号,1874年12月)中认为“我人民欠缺的是知识,不够的是开化。”因此,主张让西方人去内地旅行。他认为为了赶上先进国家,让我人民多多去外国旅行,进行锻炼,开展交际,尤为上策。但是,这点目前尚难做到。故而,若允许外国人到我国内地旅行,就能“让人民知识开化,通过与外国人的交际锻炼,日益进步。”津田在另一篇文章《人才论》(《明六杂志》,第30号,1857年3月)中认为“我日本目前的人才为我邦锁国时所培养的,即皆为日本流的人才,不能称之为世界的人才”。他主张培养自由、自立、独立不羁的风气,扩大人才的规模。

森有礼则在《英语国语化论》(1872)和《日本的教育》(1873)中认为,日本人与西方人相比,智力低下。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必须废除汉字,把英语作为国语,使教育制度合理化。

更有甚者,主张通过与洋人联姻来改良日本的人种。系统地提出这一建议的是福泽谕吉的弟子、实业家高桥文雄。他在明治十七年(1884)出版的《日本人种改良论》(出版人石川半次郎)一书中认为日本人种不如洋人,若劣等人种和优等人种杂婚,则有利于改良劣等人种,因为洋人在身高、体重、头脑各方面都优于日本人。所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早求良缘,早日杂婚,这对改善日本人种是非常必要的。高桥还认为,即使与洋人结婚,日本人也不会丧失爱国心,就像我们吃了牛肉并不会被牛同化一样。

当时,在明六社(1874 年创立)成员之间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经过明治维新的几年努力,日本人的国民性改变了没有。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之概略》(岩波书店,1931)中,把文明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两种,前者指衣食住行等肉眼可视的‘有形’的物质文明,后者指时势、人心、国俗等‘无形’的精神文明。他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有形文明发生了变化,而无形文明没有变化,封建意识仍然顽固地残留在日本社会。当务之急是,先难后易,改造人心——即国民性。

中村正直也持不变说。在《论改造人民的性质》(《明六杂志》第 30 号,1825 年 3 月)一书中,中村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也认为政体就像盛水的容器,人民好比水。水盛入圆形容器就变圆形,盛入方形容器就成方形,因此,即使政体这个容器变化了,人民——水依然没变。明治以后,政体这个容器确实变好了,但是“人民依旧还是有着奴性国民性的人民,还是欺下媚上的人民,还是没知识的、文盲的人民,还是贪图酒色的人民,还是急于读书的人民,还是不知天理、不省职责的人民,还是目光短浅、气量狭小的人民,还是不愿吃苦耐劳的人民”。

与此相反,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也在明六社的机关杂志《明六杂志》(第 23 号,1874 年 12 月)上发表悖论之文《内地旅行》。他认为“一新(明治维新)后,时过 7 年之星霜,人民的全身,甚至连骨髓都变了。”

这几种意见貌似相左,但在本质上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去掉封建残余,改造日本的国民性。

[日本主义文化论]

在‘日本人劣等说’的支配下,在明治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以明治十六年(1883)开设的鹿鸣馆为标志,日本迎来了开国以来的第一次欧化主义的高潮。针对这种倾向,许多知识分子以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创刊的政教社杂志《日本人》为阵地,主张保存国粹。地理学家、评论家志贺重昂在该杂志的第2号(1888年4月)上发表《告〈日本人〉怀抱的宗旨》一文,对国民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国粹是大和民族自远古遗传形成、保存至今的东西,它的目的是要促使人民发育成长,进化、改良大和民族。保存国粹是大和民族最重要的课题。以后,志贺又在《日本人》第6号上发表《日本前途的两大党派》一文,明确指出了欧化主义和日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认为只有日本主义才能保证日本的独立。从此以后,日本主义成为政教社的基本方针。

1891年,政教社分别出版了哲学家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伪恶丑日本人》。在前书中,三宅针对白人至上、欧化主义的风潮,指出日本人在智力等方面决不亚于欧洲人,“日本人系有为的种族”;亚细亚诸国相继败亡,而蕞尔岛国的日本却作为帝国屹立在绝海之东。……日本肩负着发挥特长,弥补白人缺陷,向着臻真、臻善、臻美的圆满、幸福世界迈进的伟大使命”。这种使命有三:第一,在追求真的职责上,要进行史迹调查,向亚洲大陆派遣学术探险队,开展东洋文化、生物、地质学、人类学的研究。第二,维护善和正义。通过富国强兵,向世界列强展示国力,伸张正义,尽力尽善。第三,向

世界宣传日本的美。他盛赞日本气候温和、风物清纯的自然美,认为日本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同时,三宅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要完成上述使命,必须克服与真、善、美相对立的伪、恶、丑。因此,他又写了《伪恶丑日本人》一书。在该书中,他毫不留情地针砭了日本社会上存在着的种种不良现象:学者间的阿谀奉承,学界受庸吏控制;不良分子和奸商为谋暴利,与政府勾结,假公济私;美术家多卑劣浅陋,只会模仿西洋美之皮毛。

三宅的《真善美日本人》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日本人不亚于欧洲人的论点,指明了日本今后努力的方向,在欧化主义盛行的当时,给了许多日本人以鼓舞和勇气。尽管他在《伪恶丑日本人》中揭露的是日本国民性中丑劣的一面,但他最终目的是期待日本能早日在世界上实现腾飞,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基于日本主义立场的。

此后不久,1894年,志贺重昂再推出《日本风景论》(政教社)一书。该书从气象、生物、地理等方面论述了日本之美,认为日本风景具有潇洒、秀丽、跌宕等独特之美。他指出,人们多以樱花来比作日本国民,但是,樱花虽美却不耐风雨,而松柏才坚强挺拔。他因此提议应将日本改称为“松国”。《日本风景论》阐述了自然地理环境与日本国民性的关系,从自然景观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日本的山川自然美,提高了日本国民的自信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人优秀”文化论〕

1895年和1905年,日本分别取得了日清、日俄战争的胜

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明治初期的“日本人种劣等论”自然早已销声匿迹,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煽动下,日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到“日本人优秀”论。

1895年,政治家金子坚太郎在青山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日本人种的特性》(《太阳》,第一卷第九十号,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9、10月)的演说。他说:“从前有人嘲笑‘日本只不过在皮毛上文明开化,决不是在精神深处,是穿西服戴高帽模仿西洋,本质上还是纯粹的日本人。’现在,日本取得了日清战争的胜利,这就完全推翻了这种观点,证明日本‘从根本上、精神上全面输入了欧美文化。’他还例举文学、宗教、美术、工业等方面的事例,来说明日本人的优秀特点在于:初为模仿,继之改造、应用,最终创造、发明。”

无独有偶,社会学家远藤隆吉在《日本我》(巢园学舍出版部,1912)中也大肆渲染日本民族之优秀。他认为,日本我——即日本精神包含以下内容:拥戴‘万世一系’的皇统,不受外国凌辱,富有勇气,淡泊质朴,……以崇拜祖先为核心的忠孝思想发达。景色美丽,五谷丰饶,拥有刀剑、樱花等外国无可比拟的东西。远藤最后的结论是,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因此,能够产生‘与外国竞争,发扬神州正气的气概’。

站在国家主义立场比较系统地为本国国民性歌功颂德的是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富山房,1907)。在该书中,芳贺把日本国民性归纳为十个特点:(1)忠君爱国;(2)崇拜祖先,重视家族名誉;(3)现实性、实际性;(4)热爱草木,崇高自然;(5)乐观洒脱;(6)淡泊潇洒;(7)纤丽细巧;(8)清净洁白;(9)讲究礼仪;(10)温和宽恕。

芳贺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国语、国文学者,本书又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日本人国民性的专著,其影响尤为广泛。继《国民性十论》问世不久,文学家、评论家大町桂月在《日本国民的气质》(1908)一书中亦如法炮制。首先,他认为敬神(崇拜祖先)、忠君、爱国为日本国体之精华,然后他例举了日本国民性的十个特点:(1)富有冒险精神;(2)不惧死;(3)知耻;(4)勇气;(5)忠君;(6)孝悌;(7)洁癖;(8)志坚;(9)知‘物哀’;(10)雅致。

1912年,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之后,又推出了《日本人》(文会堂)一书。如果说《十论》的观点尚非相当偏颇的话,那末,本书已彻底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鼓吹“日本人优秀论”。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论述以天皇为‘现人神’的国体是日本国民性的政治基础。第二章认为日本是家族国家,对家长的孝与对天皇的忠是一致的。第三章阐述日本自古以来的‘武勇’是日本取得日清、日俄战争胜利的原因。第四章从制刀要专心致志说起,强调所有的修业都应达到这种境界。芳贺又在以下各章分别赞扬了日本的衣食住以朴素为荣、富有牺牲精神、对皇室忠诚等美德。

“日本人优秀论”完全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强调敬神、忠君、爱国,在思想文化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早就偏离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的。

[国民性反思文化论]

在‘日本人优秀论’盛嚣尘上时期,尚有部分学者能够冷静、客观地认识日本文化,强调日本国民性中确实存在种种差

强人意之处,应予以反思。

岸本能武太在《日本人的五个特质》(《太阳》,第二卷第七、八号,1896年4月)的演说中,这样概括日本人的特质:(1)洁癖而忌不净;(2)快活而好美;(3)灵巧而富有同化力;(4)温雅而重礼节;(5)清贫而重义气。同时,岸本还指出,日本人存在急躁、无远见、心胸狭窄等三大短处。

与岸本从正反两面论述日本国民性不同,《太阳》杂志社主要成员、政治学家浮田和民则把日本的国民性与西方作比较。他在《国民的品行》(《日本人》第3卷140号,1901年6月)一文中认为,国民的品行由自然环境、国际环境和历史遗传三方面决定,每个国民都具有作为个人的和作为国民的两方面精神。国民精神的成长发展与个人精神的成长发展完全一致。幼稚的国民与部落民别无二致,在精神上还是小孩。日本应通过观察欧美的品行,从中发现可引以为鉴的东西。例如,英国人的长处是任何事情都重视经验,以付诸实践为先;法国人的特长是使理想马上变成现实,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被称为“东洋的英国”,但是其国民心理却与法国的短处相似,不是具有远大理想的感情型的国民。

而苦乐道人(片桐正雄)在《日本国民——品行修善论》(明治修养会,1903)中更是尖锐地批评了逊于西方的日本人的丑行:上下火车时争先恐后、在公园里采花、随地扔垃圾、宴会上狼吞虎咽的吃相、对位卑者耀武扬威、在国会大骂脏话等等。

也有人指出日本人缺乏公共事业心。如神户正雄在《日

本人道德上之缺陷》(《太阳》,第 17 卷第 4 号,1911 年 3 月)一文中认为,日本人可以忘我地为国家工作,心目中唯独没有自己,也没有世界,这是日本人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世界人道主义精神所致。

户田海市则在《关于我国民之公共心》(《太阳》,第 17 卷第 5 号,1911 年 4 月)中分析了日本人缺乏公共事业心的原因。他指出在西方,主我的意识非常强烈,而在日本,则无我的倾向非常明显。西方人以个人为主,团体为客,而日本人则是恰好相反。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公共事业往往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通过团体来介入。

值得指出的是,这时期还有一部分学者对国民性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异议。思想家、评论家纲岛梁川在《国民性和文学》(《早稻田文学》,1898 年 5 月)中,对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美德的“快活乐观”“尚武侠气”“忧虑国家命运”“富有道义心”“忠孝义忠”等称誉提出了质疑:“快活乐观”“尚武侠气”等是日本国民万古不易、天生具有的特点,还是仅一半是由历史进化的结果?换一角度来看,“快活乐观”是否可认为是悲哀厌世的结果?纲岛批判了国民性研究中的这些观念上的痼疾,认为:现代的国民性是各个历史时期以来进化演变的结果。

海野幸德在《兴国策的人种改造》(博文馆,1911)中也指出,开展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始于日俄战争后,这是国民的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以往的国民性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点——只罗列国民性的各个特点,没有从历史的、社会的方面、从动态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事实上,国民性并非是固定

的、遗传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

综上所述,明治时期,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巨大,国民性的研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起步,又深受这种环境的左右。尽管这时期诞生了形形色色的日本国民性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发展轨迹与日本在国际地位上的提高密切相关。它由初期的“日本人劣等”文化论起步,经过日本主义文化论的过渡,最后发展到“日本人优秀”文化论。在研究方法上,由或贬或褒的一元论发展成正反俱有的二元论,由静止的国民性研究上升到动态的国民性研究。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化研究就是带着上述进步和先天不足进入大正时期的。

2. 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的文化之争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进入大正时代。这时期,在国际上,由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内,随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城市中的中间阶层以及无产者的队伍迅速增加,他们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强,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思潮。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化研究,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时期出现了从国际主义的立场分析日本文化的趋向。同时,针对社会上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倾向,一部分知识界人士也予以了批判。但是,这两种文化论往往带有个人主观印象,缺乏学术

性,有些学者就根据各自的主题开展研究,弥补了这些缺陷。这时期,首次出现了研究狭义日本文化的著作。

[国际主义文化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一战后日本作为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人的国际意识。他们走出日本,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对日本文化进行了审视,出现了从国际主义立场研究日本文化的新动向。

这种新动向的先驱者为评论家茅原华山。他在《地人论》(东亚堂书房,1913)中,大胆地批判了国民性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的错误倾向。指出,《古事记》、《日本书纪》并非史书,而是神话传说;《太平记》也多有曲笔、粉饰现象。由此说明,日本民族是轻实际事物而重想象的民族。他还抨击了日本人的好战倾向,指出日本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敌视外国,发动战争,动辄以武力恫吓。因此,没有圆满的外交活动。茅原还指出,不少国民以为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也就成了上等国家,日本的国民性也就“冠绝万国”了,其实远不然。日本不仅需要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并且也需要改善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茅原的批评,视野开阔,一针见血,非常尖锐。它与当时充斥社会的大和魂、武士道空泛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教育学家野田义夫在《欧美列强——国民性的训练》(同文馆,1913)中,也对“日本优秀说”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日本无论与世界上哪一个列强相比,都不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他在《日本国民性研究》(教育新潮研究会,1914)

中,进一步从正反两方面具体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

在该书中,野田认为,国民性由先天遗传和后天学习两方面决定。战争,说到底就是国民性的竞争。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重视对国民进行后天训练。他反对一味称颂日本国民性中优秀的方面,主张对丑劣的一面也进行反省。

基于这种观点,野田首先列举了日本国民性的十大长处,它们是:(1)忠诚;(2)洁白;(3)武勇;(4)名誉心;(5)现实性;(6)快活淡泊;(7)敏锐;(8)优美;(9)同化;(10)有礼貌。同时,野田又对上述长处所带来的弊端逐一进行分析。

“‘忠诚’会引起狂热的忠君爱国之情和排外思想;‘洁白’会失去对人宽容的雅量,心胸狭隘;‘武勇’会虚张声势、固执好战、感情麻木;‘名誉心’会使人追求功名,注重虚荣,惧怕耻笑;‘现实性’会造成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目光短浅;‘快活淡泊’会产生享乐主义,缺乏时间概念、经济思想和商业道德;‘敏锐’会使人轻率、武断,缺乏耐心;‘优美’使日本人的兴趣面狭窄;‘同化’力强会注重模仿,雷同附会;‘有礼貌’会造成许多繁文缛节,抑制感情。野田告诫日本人,要不断进行反省和提高修养,不要沉溺于自己的长处之中。长处、短处都是相对的,处理不好,长处也会变成短处。野田从正反两方面对国民性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大大深化了这时期的国民性研究。

1913年,日本出版了一套《寻常小学国语读本》。在六年级教材中,第二十七课题为《我国民性的长处和短处》,集中反映了当时学界的共识。现引述如下:

“我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国体,具有三千年的光辉历

史,现在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民拥有优秀素质的缘故。衷心忠于天皇,孝顺父母,这种忠孝之美德举世无双。忠孝为我国民性之根本,由此而产生其他许多良好美德。日本位于东海岛屿,这颇有利于国家建设。四周大海构成天然城壁,不容外敌窥视,不使国家受到威胁、国民生活受到侵犯,国泰民安……。此外,我国的美丽风景和温和气候,使得国民性格沉稳,形成热爱自然的柔和性情。

但是在另一方面,岛国也造成了国民的不少短处。我国民生活在狭小的岛国,容易在这块乐土中安逸于和平生活,思想趋于保守,精神不思奋斗,一味贪图享受。温和的气候、美丽的风景,使得性情柔和、优美,却难以培养雄伟、豪放的气质。尤其是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政策,消磨了国民向海外发展的意志,视岛国这个天地为理想之地,不知世界形势。其结果,现在也有国民不理解社交的重要性,缺乏相信别人、容纳别人的肚量。因此,移居海外的我国民,受到外国人的无端误解和排斥。……今天,我国在世界上已跻入列强之中,这些短处将会从我国民身上消去,我们的任务是,尽早将它们一扫而净。日本国民吸收了支那、印度文明,引进了西洋文明,是聪明、机智的国民。消化他国的文明,灵活地为我所用,这是我国民的一大长处。但是,其反面也成为短处 自古以来,我们专事模仿,缺乏创造力……。

我国民好清洁、淡泊,……它使我们能发挥重廉耻、喜清洁的长处。反之,它也使我国民性急、暴躁,缺乏坚韧不拔,坚持到底的毅力……。

我国民的长短处,此外还有不少,我们应了解自己的长

处,充分发挥它 同时,时刻注意自己的短处,将它克服,就能成为无愧于大国地位的国民。”

文中列举了日本的长处 忠孝、气候适宜、风光美丽、善于吸收别人长处、好清洁,同时又指出了它的短处 保守、不思上进、缺乏豪放雄伟之气概、没有创造力和毅力等等。不少观点与野田有异曲同工之处。

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日清、日俄二大战役和一战的胜利,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列强。往日的“日本人劣等说”一扫而去,整个日本充斥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后的自满情绪。一部分知识分子人士冷静地看待这一切,指出日本国民性中丑劣的方面,以此来促使国民反省。他们批判日本的目的,往往不是批判日本的国策而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为的是怎样通过改进国民性来保持日本大国的地位。因此,上述野田和教科书中对日本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从学术上讲,比以往的一边倒——或评价过低、或评价过高的日本文化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但从政治上看,他们的基本立场没有变,依然采取忠君爱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

[反欧化主义文化论]

第一次大战的鲜血,换取了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大大地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日本国民的自信心。继明治时期第一次欧化主义之后,日本迎来了第二次西化的高潮。如果说,明治时期主要接受的是欧洲文化的话,这次是欧美文化携手东侵,日本受到西方文化更广泛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崇拜西洋的风气,著名作家谷崎

润一郎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大正四年(1915)发表的作品《独探》(《新小说》,1915)中,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崇洋的心情:

“西洋拥有远比我们伟大的艺术。提及西洋,它的万物皆美,令人羡慕,我们为生长在日本而悲哀。……若有可能去一下西方,不,岂止去一下,真想移居那里,完全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埋下骨灰。……然而,目前我的境遇不用说移居,连去一下都不可能,我不能不为自己的不幸感到悲哀。”

画家荒井陆男也非常崇洋,他在《特殊性情国》(文化生活研究会,1923)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对日本的生活习惯等横加指责,把日本贬义地称为世界上独特的“特殊性情国”。此书从自己结束长年的留洋生活回到日本后的第一印象写起。他说,回国后首先感觉到的是木屐的声音。穿着木屐走路的声音,让人感到心烦难受,更加使日本人成为神经质的小国民。日本人长相不好,这是天生的,没办法,但对穿木屐这种丑相,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日本人挨揍还装着不痛的样子,内心不满,表面上却又装得若无其事。都说日本人好清洁,爱洗澡,其实这是因为日本的和服、日本的房屋是开放式的,容易进灰尘,日本的道路又是世界上最脏的,所以才不得不经常入浴。

针对这种唯欧美马首是瞻的风气,不少知识分子予以痛斥。早在谷崎和荒井发表上述议论之前,文学家永井荷风就对盲目崇外的现象进行了嘲讽。他在《厕所之窗——杂感一束》(《三田文学》,第4卷第8号,1913)中指出,目前有这么一种倾向,认为西洋的月亮比日本的圆,例如:“如果有人说我昨晚香槟酒喝了太多,今天有点头痛,那就说明他与上流社会

有交际,即人品高雅 但是如果说喝了日本酒,今天醉意尚存,那就会遭人白眼。”

几乎与此同时,植物学家远藤吉三郎也猛烈抨击了这种现象,他在《呜呼 西洋》(博文馆,1915)中,肯定了西方的长处,但同时又为日本人迷信舶来品惋惜 商品包装上要写上洋文,化妆品要冠以外来语商标,否则就会卖不出去。许多人认为西洋人比我们人种优秀。远藤认为,盲目崇洋、欧化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批判西洋的时代,应该在批判的基础上甄别,确实好的再予以输入。

值得指出的是,远藤是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崇洋现象展开批评的。他认为,二千五百年来,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一滴外国人的鲜血,一次也没有被外国占领过,这是大和民族的最大特征。他要求青年男女不要让与大和民族不相容的文化、文明进入日本一步。号召国民性研究者深入研究西洋文明的弊端,不以“野蛮”为耻。提倡对西方文明采取“精神锁国”。

[多角度的文化论]

大正时期,人们从历史、文学、宗教、体育、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对日本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除了个人论著外,还诞生了几部论文集,颇引人注目。

一部为大町桂月主编的《美点弱点长处短处——日本研究》(日本书院,1916,后改名《日本国民性解剖》)。日本取得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后,举国上下充满一种成为“世界一等国”国民的骄傲情绪,针对这种情况,35名知名学者、政治家